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初編

林慶彰主編

第13冊

孫覺《春秋經解》解經方法探究

劉德明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孫覺《春秋經解》解經方法探究／劉德明 著——初版——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23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第13冊）

ISBN：978-986-6657-85-6（精裝）

1.（宋）孫覺 2.春秋（經書） 3.學術思想 4.研究與考訂

621.7

97016111

ISBN - 978-986-6657-85-6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三冊

ISBN：978-986-6657-85-6

孫覺《春秋經解》解經方法探究

作 者 劉德明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孫覺《春秋經解》解經方法探究

劉德明 著

作者簡介

劉德明，1968年生，2004年取得中央大學中文博士學位。現為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對諸多事物有廣泛的好奇。專長為中國義理學及《春秋》學，曾發表關於《春秋》、孟子、莊子、董仲舒、朱子、康有為、《四庫全書總目》等十餘篇經學、子學相關論文。

提 要

本文主要透過研究孫覺之《春秋經解》一書，論述關於《春秋》的解讀問題。《春秋》是儒學重要的核心典籍，但是其內容卻非常簡少。自孟子起，歷代儒者多視《春秋》為孔子最後一本親定的典籍，並且認為其間有孔子隱含之「大義」。既有「大義」就必須透過解讀方能使其彰顯於世。所以自三傳起，對《春秋》之詮解莫不以能探得孔子深藏於《春秋》中之「大義」為主要目標。但一則《春秋》本文簡略，二則號稱源自孔子的《公羊》《穀梁》與《左傳》三傳亦彼此攻擊，於是《春秋》隱微之大義更不容易知曉。自唐代啖助、趙匡與陸淳等人，想超脫三傳陳說束縛，重新對《春秋》加以解讀。其固然開啟一種新的解讀之風，但亦不免有「憑私臆決」與「穿鑿詭辯」之譏。這是因為啖助等人在力求突破三傳舊說時，在解經方法上沒有足夠深刻的反省。《春秋》學在宋代經學中比重最高，名家輩出。孫覺之《春秋經解》從解經方法的發展歷史來看，其不但繼承了啖、趙等學風，而且發展出更加完整的《春秋》解經學。其書雖然流傳不廣，其聲名雖不著於世，但其成就則不應被世人所忽視。筆者僅就孫覺《春秋經解》一書為例，考其版本，說明其解經方法，以期對宋代《春秋》學以至《春秋》解經方法，有更深入的理解與研究。



目次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二章	《春秋》解經的問題背景——《春秋》定位與三傳解經方法	9
第一節	《春秋》一書的性質	10
第二節	《春秋》與孔子的關係及其地位	17
第三節	《春秋》經的解讀問題	24
第四節	三傳解《春秋》：追尋孔子原初的意旨	28
第五節	三傳「以事解經」方法的內容與檢討	37
第六節	三傳「以義解經」方法的內容與檢討	48
第七節	本章小結	59
第三章	《春秋》解經方法的轉變與突破——唐代啖助學派的地位與問題	61
第一節	啖助等人對《春秋》的定位	65
第二節	啖助等人對三傳的批評與檢討	70
第三節	啖助的解經方法	75
第四節	本章小結	82
第四章	孫覺生平與《春秋經解》版本	85
第一節	孫覺的生平與著作	87
第二節	《春秋經解》的版本問題	93
第三節	本章小結	106

第五章	《春秋經解》的書法內涵與問題	109
第一節	從〈自序〉看孫覺對《春秋》的定位	109
第二節	孫覺論《春秋》「書」與「不書」	115
第三節	「一字爲褒貶」的類型	128
第四節	以「書法」詮解《春秋》的困境及解決方法	139
第五節	本章小結	156
第六章	《春秋經解》詮解《春秋》的思想基礎	159
第一節	孫覺對胡瑗說《春秋》的取捨	160
第二節	孫覺對三傳之說的取捨	169
第三節	孫覺詮解《春秋》的價值基礎與核心	179
第四節	《論語》、《孟子》解《春秋》：以「君臣關係」與「王霸之辨」爲例	188
第五節	本章小結	207
第七章	結 論	209
附錄：	《春秋經解》各版本闕文對照表	217
引用書目		221
後 記		231

第一章 導 論

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經書」自有其特殊的地位，許多學術活動是依循著解經而產生的。僅就四庫全書來看，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部即已繁浩難盡，但核心卻僅為十三部經書，除此之外絕大部份的典籍都是圍繞著這十三本書籍而產生的論著。從這些對於「經」的注疏中，我們不但能看到解經者對經書的獨特立場，更能從其詮解的方式看到「經」中間所包蘊的問題。在這經解傳統中，《春秋》這部書的解經問題是非常特殊而有興味的。

清儒毛奇齡曾說：「《大易》、《春秋》，迷山霧海，自兩漢迄今歷二千餘年，皆臆猜卜度，如說夢話，何時得白？」〔註 1〕可見在儒家經典中，《春秋》是被視為最難理解的典籍之一，許多人都用自由猜測的方式來看《春秋》經的內容。而《春秋》之所以如此難解、其內容之所以人言人殊，主要的問題在於詮解《春秋》的方法學上存在著幾個難題。由歷史中對《春秋》內容漫長的討論裡，大約可以歸納出詮釋《春秋》在方法上最主要的三個問題：

一、《春秋》一書的作者與性質問題：《春秋》一書的內容若用素樸的眼光去看，很容易就將之視為歷史書籍，因為其內容主要為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之事，歷時二百四十二年。用現代的標準去看《春秋》，《春秋》是一本過於簡略的史書。尤其是相較於《左傳》有繁富記事內容，《春秋》不但在內容上相形見絀，而且所記簡直漫無章法。所以歷來詮解《春秋》的學者自覺或不自覺的都接受一個說法：《春秋》是經書，而非史書。《春秋》之所

〔註 1〕（清）毛奇齡：《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高宗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卷 18，〈與馮山公論孟書〉，頁 14。

以會是經書，其實與其作者有相當大的關係。《春秋》的作者在歷史記錄上其實並那麼不明確，但一般將《春秋》視為經書的儒者都相信《春秋》為孔子所作。換言之，對《春秋》作者的認定與《春秋》的價值與定位，常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所以任何要詮解《春秋》的學者，首要之務往往即是要對《春秋》的作者及書籍性質做出確切的說明。

二、三傳詮解《春秋》的可信度問題：儒者通常將《春秋》視之為經，目為孔子最後的一部作品。但《春秋》內容卻極為簡略，簡直無從讀起。自孟子起，即認為《春秋》中具含「褒貶大義」。問題是《春秋》書中並沒有任何直接關於「大義」的書寫，僅只有一條條看似歷史的記錄。於是自漢代起，《公羊》、《穀梁》與《左傳》三傳先後成書及出現，並極力爭取對《春秋》的解釋權。這其中當然夾雜現實利益的問題，但除此之外三傳均自認是要正確了解《春秋》的最重要而且唯一途徑。三傳說明自身最能詮解《春秋》的策略大略而言有兩種方式：一是說明自身的說法直接源自孔子，所以最能展現孔子著《春秋》的內在意圖。二是從《春秋》一書的內容中取得支持其說的依據。就三傳分別展現孔子著《春秋》的內在意圖來說，三傳之所以能夠詮解《春秋》是因為他們都各自標明其說來自孔子口傳。這等於孔子這個作者，親自出面來說解自己在書中所隱含的內容大義。若這種說法得以確證，則其詮解《春秋》的權威性自不待言，正確無誤地詮解出《春秋》中所隱含的「大義」也不是什麼難事。但可惜的是，三傳對於自身的來源都沒有提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證據，所以三傳在漢代時即不斷對彼此的傳承有許多的質疑，最後終究使得這種建立詮解權威的策略不容易令人信服。再從依據《春秋》內容的詮解策略來看，三傳用以詮解《春秋》內容的方式大致又分為「以事解經」與「以義解經」兩種。其中《左傳》較偏重「以事解經」，《公羊》、《穀梁》則較偏重「以義解經」。這兩種不同的解經方式的差異雖不完全在同一層面，但兩方均認為自己的解經方法才能真正詮說出「《春秋》大義」。更令人感到困擾的是，《公羊》、《穀梁》的解經方法雖然類似，但其對《春秋》內容的理解卻又不盡相同，彼此又相互挑戰攻擊。所以在三傳之後詮解《春秋》的學者，自然必須說明其對三傳的態度為何？是專信一傳之說？抑擇取三傳之長者從之？若專信一傳，則要完全依其所繼承的師說來詮解《春秋》，不可有一絲一毫的個人己見，因為那是直承孔子之意。若要擇取三傳之長者從之，那麼要用什麼標準來選取？也就是要三傳之說中，擇取何者可從、何

者爲否，這個選擇、判斷標準的內容是什麼？又從何而來？

三、如何建立客觀詮解《春秋》的方法：若不接受三傳是對孔子書作《春秋》意圖直接記錄的說法，那麼孔子在著作《春秋》的時原始意圖便縈不可尋。後人想發掘孔子著作《春秋》的大義，就僅能從《春秋》一書來看。若三傳之說不可盡從，那麼當然要試圖建立起一套客觀的詮解《春秋》的方法學。由於《春秋》一書的內容並不多，所以要客觀詮解《春秋》至少要滿足兩個部分的要求：一、對《春秋》內部條例的歸納與說明。二、對《春秋》褒貶價值觀的說解。就對「《春秋》內部條例的歸納與說明」部分而言，其實由三傳起這即是詮解《春秋》者的共同方法，三傳均用以說解《春秋》，但是僅有極少的詮解者會認真且全面的看待這種方法。也就是說多數的詮解者並不一定會仔細且全面的看待這種方式，並且將之視爲詮解《春秋》時不可動搖的內部理證。之會所以如此，可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春秋》本文中並不一定能清楚且明確的歸納出這些條例，甚至有學者根本懷疑《春秋》中這是否真實存在這些條例！但對回歸《春秋》文本的詮解者而言，如何從《春秋》原文中歸納出某些字詞的特定使用方式，並且能對於不合這些使用方式的例外部份善加說明，便是詮解《春秋》時具有挑戰性並且很重要的工作。至於「對《春秋》褒貶價值觀的說解」更是詮解《春秋》者一個更爲核心的基礎。《春秋》中寓含褒貶大義，這幾乎是所有詮解《春秋》學者的共同預設。但《春秋》對那些人物是褒，那些又是貶呢？孔子是以何種價值觀來褒貶人物？這個問題對三傳而言並不重要，因爲就三傳自己的說法，三傳本身來自孔子，所以對爲何褒、爲何貶的問題是不需要回答的，因爲其說均依孔子之言所記。但這個問題對不依憑三傳的詮解者來說則是極需加以回應的，因爲若不能對此提出一個有根據且合理的說法，則其對《春秋》的理解將陷入直覺且個人式的說法，並不能擁有很好的說服力。

以上三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都是詮解《春秋》在方法上必須要回應的問題，而且彼此環環相扣。但是這並不代表在歷史中的儒者都會對這三個問題詳細的思索並提出解答。儒者往往因爲整個時代環境的學術氣氛而集中在回應其中的一或兩個問題。如《春秋》的作者問題，在一千多年來的《春秋》詮釋中，這個問題只曾被少數的學者認真思考過，直到民國初年時才被顧頡剛等古史辨學者正式提出並成爲一個重要的問題。^{〔註2〕}但是也因爲如此，顧

〔註2〕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1987年），頁63～74。

顏剛等人反而沒有在第三個問題上有所著墨。

對於一本典籍內容的理解之前，在詮釋方法上的反省是必須的，尤其是對《春秋》這樣一部重要卻人言人殊的經典。因為若沒能清楚的對於詮釋《春秋》方法問題做出清楚的反省，其詮釋內容往往容易像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般容易消毀。本文的重心在於從歷來對《春秋》的討論中，抽繹出在解經方法中的諸多問題，並試圖展現儒者對這些問題的反省。當然，限於學力與篇幅，筆者自不可能詳盡的討論歷來對《春秋》的諸多注解。所以筆者採取以論題導向為主的論述方式，從以上所提列的三個問題中藉由不同學者的看法，反省其間的問題，並由此觀察詮解《春秋》的限度與基礎。正如司馬遷對於孔子所以著《春秋》的原因為「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在中國解經傳統中少有儒者會離開經典文本，獨立的論述一套解經方法。儒者通常是在具體的解經行動中論述及呈顯出自身獨特的解經方法，所以對《春秋》解經方法的反省亦須透過實際詮解《春秋》的典籍，方能真正探知其間的問題。基於這個緣故，筆者選擇了宋代儒者孫覺所著的《春秋經解》做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從《春秋經解》對《春秋》的諸多解釋中，對比及反省詮解《春秋》在方法學上的諸多問題。筆者之所以選擇孫覺《春秋經解》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宋儒對傳統諸經的許多注解有所不滿，宋初石介（1005～1045）說：「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慌忽，如盲者求諸幽室之中。」〔註3〕所以產生了一連串對經典重新著解的風潮，其中尤以對《春秋》的解說為然。在現實而言，對原來行諸久遠的傳統註疏不滿而重新建構新的注解的同時，自然會在解經方法有諸多反省。所以宋代初期對《春秋》重新詮解的典籍，自是研究《春秋》解經方法很好的材料。二、今人對宋朝初期《春秋》的重要注解，如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及劉敞《春秋傳》等書多有深入研究，但對當時有享有盛名甚至日後對胡安國《春秋傳》影響深遠的孫覺《春秋經解》卻少有人提及。這不論是對宋朝《春秋》學的研究或《春秋》解經方法的反省來說都是一個缺憾。所以筆者選擇了以孫覺的《春秋經解》做為主要的研究題材。

其中舉歐陽修、崔述等人為例，說明在儒學史上實有儒者因為信孔而對「經」的作者產生懷疑。

〔註3〕（宋）石介：《徂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高宗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卷15，〈上孫少傅書〉，頁3。

任何一位《春秋》的詮解者並非單純的面對《春秋》本文而已，而是同時面對著《春秋》本身所涵蘊的問題及由漫長《春秋》解釋史中發展出或顯或隱的問題與困境，所以要深入了解與評估單一詮解者的貢獻，亦勢必先行了解其所面臨的背景問題與處境。

根據以上的論述，筆者擬分別在本書各章中分別論述的主題為：

第二章為孫覺詮解《春秋》的問題背景 I：本章主要討論兩個《春秋》學的基本問題為主：《春秋》一書的來源、性質與三傳解經的可信度。《春秋》來源眾說紛芸，本文試圖以歷來對此問題的諸多相關論述，說明《春秋》一書的獨特性質，及在詮解《春秋》時所必須承認的預設。至於三傳的可信度問題，則是透過三傳學者對其他二傳的批評，說明三傳權威的崩解其實是由「來源可疑」及「義例之說的興起」兩個內部原因。因為以上兩個問題，在歷史上並不是有次序的發生，所以本章在論述時並不以歷史的發展為軸線，而是從《春秋》的核心問題為論述起點。本章擬先討論《春秋》作者問題，縱使對這個問題的豐富討論在歷史上產生的最晚，但從解經方法的反省上卻是最核心的問題。此外要特別說明的是本章在引述漢代對《春秋》的解釋時，特意忽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這個做法若從《春秋》的解釋歷史來看是難以接受的。因為不論是從對實際政治的影響或從《公羊》家的角度來看，《春秋繁露》都是十分重要的作品。但筆者之所以僅將焦點放在三傳，主要是因為從現存資料來看，三傳都是對《春秋》一書全面的解釋，而且其主要用意也在解釋《春秋》一書。從這個標準來看，《春秋繁露》反而不是專門對《春秋》的注解——至少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注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沒有特別對《春秋繁露》加以說解。這並不是說《春秋繁露》不重要，而是在性質上它與一般的注解差異太大，所以並沒有納入而予以討論。

第三章則為孫覺詮解《春秋》的問題背景 II：本章主要在論述三傳的權威受到懷疑後，如何在現實上發展出一套詮解《春秋》的方法。若三傳之說不可盡信，那麼要如何才能詮解《春秋》呢？唐代啖助、趙匡與陸淳三人所著《春秋集例纂例》等書，是對「回歸《春秋》原典」的這種新處境做出第一個完整的嘗試。在啖助等人的書中，主要在解決兩個解釋《春秋》的問題：一是要如何指出三傳詮解《春秋》錯誤之處。二是要如何提出可以平等看待三傳之說，並進而詮解出《春秋》大義的方法。啖助等人於是發展出三種解經方式：「以例傳《春秋》」、「以他經傳《春秋》」與「以理傳《春秋》」。其中

尤其是「以例傳《春秋》」更是啖助等人主要使用的方法，這從其書以「纂例」爲名即可窺之一二。嚴格來說，這三種解經方法並非爲啖助等人所獨創，在三傳之中即已用「例」來詮解《春秋》，杜預更有《春秋釋例》一書。但是啖助等人特別的是，他們將這三種解經方式提高到可以用以批評三傳的層次，而不僅是將其用作輔助性的說明而已。啖助等人的做法對詮解《春秋》的方法來說無疑的是有很大的推展，其帶來最主要也最成功的影響是打破了號稱口傳於孔子，能充分彰顯作者原意的三傳解經傳統。但是要進一步由《春秋》經文本來看《春秋》的解經方式，則是由宋儒所開展出來。啖助等人對《春秋》的詮釋與理解，常常被批評爲「以己意解《春秋》」、有「臆斷之弊」。也就是說，啖助等人在對於《春秋》褒貶的價值根源的說明與建立其實是缺乏的。宋儒在啖助等人的影響下，對《春秋》研究風氣大盛，不論是從宋儒對諸經的註解或是對《春秋》研究史的角度來看，宋代的《春秋》學均是盛極一時。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中，較啖助等人更進一步，滿足方法上的兩個要求，而能真正且完整回應及建立客觀詮解《春秋》的方法，則是由宋代學者所發展並完成的《春秋》解經方法。其中孫覺的《春秋經解》則是最早、最完整卻不被重視的代表。

第四章在介紹孫覺的生平及《春秋經解》的各種版本。宋初的學者中，胡瑗（安定）對宋學發展有非常重要影響，其對《春秋》的詮解有《春秋口義》一書，但其後不傳。胡瑗的弟子中，詮解《春秋》最有名的兩位學者當爲：程伊川及孫覺。伊川的《春秋傳》雖沒有完成，但在《春秋》學史上赫赫有名，連南宋的胡安國亦深受其影響。而胡安國的《春秋傳》則成爲元、明兩代取士的定本，流風所及，影響不可謂不大。相對的，與伊川同時的孫覺所著《春秋經解》一書首尾具足，雖在成書時即受到相當大的重視，卻因後人能得見者不多，所以聲名不著。今讀其《春秋經解》一書，實爲宋代《春秋》學之重要著作，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因《春秋經解》傳諸後世的本子極少，其中又有十三卷本與十五卷本等等的差異。所以在本章中，筆者對比了「舊鈔本」、「通志堂本」、「王鈔本」、「正誼齋本」、「四庫本」與「聚珍本」六個版本的《春秋經解》，澄清在歷史上的諸多令人困擾的說法，並介紹各本的特色，及本文所引用的底本。

第五章在說明孫覺對《春秋》內部條例的歸納與說明，也就是「以例解《春秋》」的部份。《春秋》書法自三傳起即成爲客觀研究《春秋》的一個非

常重要的重點，其中筆者將「《春秋》書法」分為兩個層次論述：「書」及「如何書」。所謂「書」指的是孫覺認為孔子對《春秋》「書」與「不書」其實是有一特定標準：「違禮反常則書」，除此之外，幾乎不書。至於決定何者可以「書於《春秋》」後，第二個層次則是「如何書」。筆者歸納了孫覺幾種重要「《春秋》書例」的說法，更檢討孫覺對於「變例」的處理方式。由變例的討論中，發現以「《春秋》之例」解《春秋》時，其實更核心的問題應是對《春秋》褒貶標準的理解與基礎。

第六章則在處理孫覺詮解《春秋》時的褒貶基礎問題。一般認為孫覺之說主要依憑其師胡瑗及《穀梁》傳，最多再上加啖助、趙匡等人的說法。但在筆者的對比中發現，孫覺直接引述《穀梁》之說時，大部份都是在批評其說不當。至於對啖助、趙匡等胡瑗之說，雖有採擇，但亦不是全依其說。孫覺詮解《春秋》褒貶最核心的依據其實來自《易經》、《書經》、《詩經》、《論語》與《孟子》五書。其中又以《論語》與《孟子》最具特色。筆者以孫覺「反對諸侯殺大夫」與「對齊桓公的評價」兩個問題為例，論述孫覺以義解《春秋》的獨特的義理學基礎。

第七章結論則從學術史及《春秋》解經方法兩部份，綜述孫覺《春秋經解》的成就與價值，以期對孫覺的學術價值有一適當的評價。

各家在解讀《春秋》這部經典時，其實都有著不同的預先設定的立場，在彼此無法了解自身及同意他方的預設立場前，其爭議往往是沒有焦點或在不同層次的討論。本文最主要的重點不在於說解《春秋》是部怎樣的典籍，或這部典籍之實質內容究竟為何。而是試圖透過歷代許多學者對《春秋》不同的看法中，抽繹出其背後的立場。而透過這種方法學上的探討，最後或許得到一個怪異又普遍的結果：儒者用何種態度來看待《春秋》，《春秋》就可能如同儒者的看法而展現出何種結果。換言之，我們看待《春秋》一書的性質及我們所了解《春秋》的內容與我們對儒學內容的理解，這三者往往是相互緊密關聯的。

第二章 《春秋》解經的問題背景—— 《春秋》定位與三傳解經方法

本章主要討論的重點有二：《春秋》的特質及三傳解經方法的特點與檢討。一般而言經典價值的來源可能有兩個：一是經典本身的內容，二則是繫於經典的作者。絕大部份經典屬於第一種：典籍內容本身即具有深度與價值，並不需要由作者權威來保證。但也有極少數的典籍其本身價值並不十分明確，對其作者的認定往往會決定了其書的價值，《春秋》就是這樣一部特殊的書籍，書的價值定位決定於對其作者的認定。所以對《春秋》一書性質的討論是理解《春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此外，由於《左傳》、《公羊》與《穀梁》三傳是歷史上最早對《春秋》全書予以詮解的作品。而三傳都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所以在詮解《春秋》時往往會以表詮出孔子著《春秋》的意圖，做為其理解《春秋》內容的主要方向。但孔子著《春秋》的意圖在《春秋》本文中表現的並不十分明顯，所以三傳在詮解時主要有兩個重點：說明自身看法直接傳自孔子及從《春秋》中的文字得到支持。三傳一開始主要即在說明自身解經內容傳自孔子，所以其說最能闡發孔子之意。這種以發揮孔子著《春秋》時原意的詮解方式，在《春秋》詮解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受到懷疑，於是三傳學者又提出「以事解經」與「以義解經」兩者詮解方式。兩種解經方法又與三傳來源相互有所關連，所以要詮解《春秋》一書勢必要先行理解及反省三傳的解經方式，才可能對《春秋》解經方法有進一步的發展與認識。

在正式進入本章論述之前有一點要特別提出說明：其實「以事解經」與「以義解經」並不是一對很好的用語，因為「以事解經」者未嘗不以追求《春

秋》之義爲終極目標，只是其相信追求《春秋》之義必須透過對「事」的理解，方有可能獲知《春秋》之義。所以筆者認爲不妨將「以事解經」與「以義解經」這對詞語改爲「即事求義」與「因字解義」，更能代表兩種不盡相同的解義方式與其各自的特點。但因「以事解經」與「以義解經」已爲學界所通用，爲求閱讀方便，故仍沿用此一對名詞。本章內容分爲幾個小節：第一小節主要在討論《春秋》此書本身的特性。從若只用素樸的眼光將《春秋》僅視爲是「一本書」，那麼《春秋》該是怎樣的一本書談起，說明作者與書籍之間的複雜關係。第二小節在討論當《春秋》與孔子相關連後，對《春秋》這本書籍的地位造成何種影響。當然不可避免會對孔子的定位問題加以討論。第三小節在說明當《春秋》因孔子而成爲「經」之後，學者對其內容性質的重新定位及如何解讀的種種問題。第四小節在說明《春秋》成爲「經」後，由解「經」而有「傳」的種種問題。《春秋》最特殊的地方在於其有「三」傳，而這三傳分別對自己的解經資格做出一個方式相同但內容不同的說法。希望從解經來源的說明中，能獲取對詮解孔子著《春秋》之意的正當性。第五小節在說明並檢討三傳解經的第一種主要方法：以事解經。並檢討這種解經方式的有效性。第六小節在說明與檢討三傳解經的第二種主要方法：以義解經。論述並檢討這種解經方式在三傳中的運用及其限制。進而指出以這種方式解經最後終於造成三傳自身權威的崩解，並使詮解《春秋》進入「折衷三傳」時期，最後使詮解《春秋》者脫離三傳權威，重新看待並詮解《春秋》。

第一節 《春秋》一書的性質

一般而言，書都有作者，這個作者可能是一個人也可能是一群人，如現在我們大致相信《呂氏春秋》一書並非由呂不韋（？～西元前 235）所著而是由其賓客們所完成的，依《史記》所記：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註1〕

〔註1〕（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大申書局，1977年）〈呂不韋列傳〉，卷85，